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张 勇^{*}

摘要：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是中国深化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而劳动力转移主要受国家制度、政策、教育水平、地区收入差距和资本密度的影响。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地区保护和户籍限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对劳动力转移的传统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阻力。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是中国很多地区贫困的根源之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实证分析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城市居民收入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而是城市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就业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 地区保护

一、引言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每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成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而不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还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和拉美国家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但农业劳动力顺利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东亚地区经济一直稳步发展，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而拉美国家快速的城市化则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严重的发展不均衡，居民生活条件恶化，社会动荡不断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一直稳步向城市转移，尤其是 1993 年后，其转移速度不断加快。目前，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人数不到劳动力总数的 40%。从最早的打击“盲流”，到后来农民工在歧视的目光下艰辛地打工，再到不久前的“民工荒”，农业劳动力转移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种转移的原因何在？是什么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和模式呢？

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人口迁移对就业、资本密度和收入的影响，而且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移民。Marr 和 Siklos(1994) 基于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利用加拿大 1962 - 1990 年的数据分析了失业和移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78 年以前加拿大国际移民对其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但是 1978 年以后国际移民对此的影响则较为显著，国际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加拿大的失业率；但是 Marr 和 Siklos 的研究并没有证明国际移民和失业率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事实上，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可能是失业率增加的主要原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Marr 和 Siklos 对 1978 年之前样本的研究不能证明移民与失业存在相关关系。Laryea(1998) 在随后对美国样本的研究中分析了外国移民对国民收入的冲击，发现移民对收入的增加有正的影响。Feridun(2005) 选取了移民相对较多的北欧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移民对瑞典、芬兰等国人均 GDP 有正向作用而对失业率没有影响。

国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及相关社会经济状况研究的论述比较多，赵树凯(1998) 就农业移民带来的城乡就业冲突、社会经济和安全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早期的研究；李仙娥和王春艳(2004)、姚程(2006) 等对拉美和东亚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做了介绍。

但是整体来说，国内的上述研究大多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进行的概述，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模型和实证分析；对于这种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究竟有多大

^{*} 张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eucnqd@yahoo.com.cn。

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国统计数据(2007) (<http://www.stats.gov.cn/tjsj/bmsj/>)。

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大国而言,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和文献还比较少;而且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于失业冲击和收入影响方面,而对于劳动力转移的机制还缺乏实证性研究。

国外学者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进行了很多实证分析,但主要集中于国别间的移民经济,即移民对收入、就业率等方面的影响。尽管也有部分学者针对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内部人口流动做了分析,但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不仅仅局限于资本因素,所以没有多少借鉴意义。

因此,基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状况,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以往国内基于规范分析和简单数据对比分析进行的研究,以及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国家间移民问题的研究,利用新古典模型,推导并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内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从而分析中国当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且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制度与文化层次和社会背景中,这是以前研究所没有涉及的。同时,本文就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如何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模型和分析方法体系的建立

(一) 模型假设

1. 假定中国国内农业劳动力只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两个部门中进行选择,没有外来移民和对外移民。这样适龄农业劳动力总数减去农业从业人数就是每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

2. 假定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增长率均为常数,且城市与农村本身增加的就业人数与人口增长率成正比。这样城市就业人数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差额可以基本确定转移的规模。

3. 假定国内劳动力转移除政策(制度)外无其他转移成本,工资差异、失业率等信息对于农业劳动力来说是可知的,且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决策是理性的。

4. 假定劳动力会根据现在的情况对未来的流动行为做出选择,因此对于主要变量,我们采用迟滞变量作为回归变量计入模型。

5. 假定工资水平、地区人均 GDP 和资本密度成正比,这样劳动力的流动会对人均资本密度带来影响,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二) 模型推导

本文基于经典的生产函数、索洛 - 斯旺增长模型和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借鉴 Laryea (1998)、Lieberman (2000) 等人的国际移民函数,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推导本文的模型。

首先对柯布 -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端除以 L , 得出下面的人均变量的生产函数:

$$y = Ak^a, a < 1 \tag{1}$$

其中, y 代表人均产出量, k 代表人均资本拥有量。假设资本以一个固定的比例 δ 折旧, $\delta > 0$ 为常数。如果总资本为 K , 则折旧为 δK ; 如果投资为 I , 则 I 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 必须有一部分弥补折旧 δK 。 s 代表投资比例,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也可以代表储蓄率, 因此资本增量公式为:

$$\dot{K} = I - \delta K = sY - \delta K = sF(K, L) - \delta K \tag{2}$$

(2) 式两边同样除以 L 并求导, 得出 \dot{k} 的公式:

$$\dot{k} = sy - (\delta + n)k \tag{3}$$

其中, n 为人口增长率。综合 (1) 式和 (3) 式, 并且进行替换。如果用 \dot{y}/y 代表各要素的增长率, 比如 \dot{k}/k , 那么可以得出:

$$\dot{y}/y = \dot{k}/k = (g/y) + s(y/k) - (\delta + n) \tag{4}$$

由 (4) 式我们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率 \dot{y}/y 是投资与 GDP 的比例 (g/y) 以及资本产出增量对投资的转化率 $s(y/k)$ 的函数, 而 $(\delta + n)$ 则是一个常数, 表明人口增长率 n 和折旧率对资本的收敛作用, 而此处我们可以对 $(\delta + n)$ 增加一个人口迁移因子变为:

$$\dot{y}/y = (g/y) + s(y/k) - \{ (\delta + n) + m(1 - \frac{k_r}{k_u}) \} \tag{5}$$

其中, m 表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率, k_r 、 k_u 表示由农业移民带来的人均资本与原城市人均资本, 一般

$k_r < k_u$, 表明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会随迁移率上升而降低城市的资本密度, 我们按照 Barro、布劳恩等假定工资率、地区人均 GDP 和资本密度成正比, 根据 (5) 式和 (1) 式得出一个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类似的基本对数形式的移民函数:

$$m = \alpha_0 + \alpha_1 \ln\left(\frac{w_r}{w_u}\right) + \alpha_2 X + \epsilon \quad (6)$$

此处 α_0 代表一个常数, m 代表劳动力转移率, w_r, w_u 代表农村与城市收入水平, X 代表其他回归向量, 而 ϵ 为 *i. d. d.* 干扰项, 分别用制度变量 *insti*、失业率指标 *uer* 以及迟滞地区 GDP 差异 *dGDP* 替代 X , 得出下面两个模型:

$$m = \alpha_0 + \alpha_1 \ln\left(\frac{w_r}{w_u}\right) + \alpha_2 insti + \epsilon \quad (7)$$

$$m = \alpha_0 + \alpha_1 uer + \alpha_2 dGDP + \epsilon \quad (8)$$

同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失业率和劳动力转移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GDP = \alpha_0 + \alpha_1 uer + \alpha_2 m + \epsilon \quad (9)$$

三、模型结果和结论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全面反映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们选取中国国内 1983 年以来的城市和农村就业数据, 并假定人口增长为常数, 以此来推导每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规模, 并选择 1983 年为基期, 确定每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程度。

对于中国不同城市和地区间存在的差异, 我们分别把人均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地区资本密度的代表, 考察不同地区的资本密度差异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人均 GDP 是直接影响收入、福利等劳动力最关心的因素, 而固定资产投资额会直接影响工作机会从而影响劳动力的决策。GDP 的变化扣除物价和人口变动的的影响。

借鉴以前的研究, 本文引进失业率指标。因为如果一个地区失业率很高的话可能对流向这个地区的劳动力产生负的影响, 而且劳动力往往基于当期各地区收入和失业率的情况对未来的迁移做出决策。以上人均 GDP 以及工资差额均采用对数形式, 并经过标准正态分布处理。

为反映制度的影响, 我们把制度作为虚拟变量, 将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比较强的 1993 年前作为制度虚拟的分界年; 同时把农村人均教育支出作为变量来考察教育是否促进了农业人口转移。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 数据涵盖中国 1983 - 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对数据进行适当的技术性修订, 修订的主要方式是对原 MPS 体系的数据进行调整, 另外则是对部分指标进行标准正态分布处理, 然后依次利用模型 (7)、模型 (8)、模型 (9) 进行实证分析。首先, 选择劳动力转移率 (相对于 1983 年的基比数据) 为被解释变量, 制度、工资水平差异、教育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等为解释变量, 主要验证制度和收入差距等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其次, 把人均 GDP 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来验证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的结果如表 1、表 2、表 3。

表 1 对于全国样本 1983 - 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 m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 GDP
α_0	- 0.693 *** (0.231, - 2.999)	α_0	- 0.398 ** (0.216, - 1.842)
<i>insti</i>	0.463 *** (0.042, 3.875)		
$\ln\left(\frac{w_r}{w_u}\right)$	0.532 *** (0.684, 4.451)	m	0.535 *** (0.026, 20.349)
修正后 R^2	0.67	修正后 R^2	0.74
F 值	115.48	F 值	414

说明: (1) 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 1983 - 2006 年时间序列数据, 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bmsj/>。(2) 主要变量均经过标准正态分布处理, 对收入差异变量迟滞 1 年, 即利用上一年的收入差距衡量对当年的劳动力转移影响。(3) 教育对移民有正的冲击作用, 且非常显著, 但由于教育与收入差距间有显著的共线性, 因而教育因素反映在了收入差距中; 同样乡村就业人数也有显著的内敛作用, 共线性显著; 因而我们最终的模型结果去除了这两个变量。(4) **, *** 分别表明 95%, 99% 的显著性水平; 系数值下方括号内数值分别为标准差和 t 值; 模型分析基于 SPSS 11.5 软件的分析结果。

表2 对于全国各地区 2006 年相对于 2000 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模型(3)		模型(4)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 m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 ΔGDP
0	0.716*** (0.260, 2.750)	0	
uer	-0.143*** (0.063, -2.258)	uer	1.276*** (0.061, 20.79)
$dGDP$	0.406*** (0.199, 2.040)	m	0.184* (0.182, 1.37)
修正后 R^2	0.38	修正后 R^2	0.52
F 值	7.8	F 值	11.2

说明:(1)模型3:被解释变量为2006年相对于2000年的劳动力转移率差额,主要验证地区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模型4:被解释变量为2006年相对于200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主要验证劳动力转移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3)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2000年和2006年各地区横截面数据,对地区人均GDP和失业率变量滞后1年。(4)*表示9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99%的显著性水平;系数值下方括号内数值分别为标准差和t值;模型分析基于SPSS 11.5软件的分析结果。

表3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失业率的影响

模型(5)	被解释变量为失业率(uer)
0	0.41* (0.001, 30.34)
m	-0.054* (0.020, -2.623)
修正后 R^2	0.47
F 值	21.3

说明:(1)模型5:被解释变量为失业率,解释变量为滞后1年的劳动力转移率,主要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失业率的影响。(2)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1983-2006年序列数据,对地区人均GDP和失业率变量滞后1年。(3)*表示90%的显著性水平;系数值下方括号内数值分别为标准差和t值;模型分析基于SPSS 11.5软件的分析结果。

(二) 模型结论及相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表1可以看出,制度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影响为正,且非常显著,表明我国逐步放松的人口流动和户籍限制政策对劳动力转移有正的冲击作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力转移速度不断加快;1999年以后,由于农民工权益的保障越来越完善,劳动力转移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以前的主流研究所认同的,但本文把这种制度变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并从实证的角度为其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与以往国家间移民的研究类似,地区收入和资本密度的差异仍然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表1中对地区资本密度回归项的结果显著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对国内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程度比国外研究得出的结论要大得多(见Laryea等人的研究),这反映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状:我国劳动力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而工业部门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同时,该项结果也表明由于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我国劳动力对收入差距的反应更加敏感,收入相对高的东部是吸引劳动力最多的地区。

表2中失业率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失业率同样对我国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影响程度不是那么大,其原因主要是:劳动者不能及时得到各种关于失业的信息,劳动力本身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关于这几个问题国内以往的研究已经认识到,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持。

表3中劳动力转移对失业率水平的影响结果显著为负,表明劳动力转移有助于降低整体的失业率水平。以往对国际移民以及发达国家内部人口流动的研究则认为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这说明:第一,我国城市中结构性失业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城市很多初级工作必须由农业劳动力来完成,因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整体的失业率;第二,农业移民也给城市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失业水平;第三,迁往城市的收入较高的那部分正式农业移民增加了城市资本密度,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就业,比如江浙和山西一带的大量民间富豪涌入上海和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这个研究结果与以往普遍认为的农业移民可能降低城市资本密度且提高城市失业率的观点是不同的。

模型结果表明,地区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对移民有正的冲击作用,且非常显著,这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城市的建筑行业等基础设施部门,反映出我国农业移民的整体层次仍然较低,主要是初级劳动力,而基础设施部门往往是非正式部门,这就导致了我国巨大的人口流动性。在共线性检验中,该指标与人均资本密度差异有显著的共线性。同时,教育对劳动力顺利转移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样它与地区资本密度差异也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农业

就业人数对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有一定的收敛作用,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追加劳动投入来实现的,但同样与地区资本密度差异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因而在最终的模型中去除了上述三个变量。

表2中模型4的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顺利与否无论是对全国经济还是各地区经济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反映了在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追加劳动带来的增长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而低成本的农业劳动力同时带来了较高的人口红利。

本文结论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制度和政策仍然是制约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为我国放松人口流动限制、促进劳动力顺利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支持和理论解释。其次,本文还澄清了那种认为“农民工是混乱、失业和城市收入下降根源”的认识,这是我们多年来对农民工歧视的源头所在,从现实讲这也为部分地扭转政府部门和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既往看法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事实上,大规模、低成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农业劳动力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的转移整体上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低成本的农业劳动力是中国商品价格长期低于其实际价值并保持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而出口和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两大因素。今天随着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而引发的“中国制造”面临的困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由低成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是城市就业增加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

四、政策建议

(一) 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更加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制度与政策仍然是妨碍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不断放松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推进并深化改革,从而保证劳动力顺利地由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效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是一个关键。当前,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限制仍然比较多,部分东部城市通过户籍政策对劳动力所必需的经济和教育资源的获取进行了种种严格的限制,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这种限制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降低了经济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使大量劳动力集中于低效率的部门而无法转移到高效率的部门;其次,劳动力无法顺利转移是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成因之一——城市保护主义和户籍的限制导致了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使高收入城市和地区人群的购买力极其旺盛,当部分高收入城市和地区的物价上涨后,同样的商品往往也在中低收入城市涨价,从而带来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我国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经济资源过于集中、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对房地产旺盛的购买力使楼市价格节节攀升,周边城市也按其为中心城市的距离依次向中心城市的房价推进,最终导致全国性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地区保护和政策性的限制等因素导致了中国不同社会群体先天机会的不均等,从而带来较为突出的贫富差距,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因此,坚定不移地推进制度改革并取消各种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是目前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但是这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中国的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将成为反对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比如拥有大城市户口的人会担心影响自己既得福利水平和子女轻松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反对给予外来者以城市居民的待遇;在部分地区同样高考成绩的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是其他一些地区的十几倍,但出于对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部分地方坚决反对改革这种不合理的高考制度。这些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30年来,某些城市对外来人员取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资格的限制却越来越严格。在上述情况下,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合理的制度建构和适当的制度创新是保持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实现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关键。

保护农业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并改变对其的态度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另外一个重要制度因素。以往,政府对农业劳动力的忽视以及城市居民对农业劳动力的歧视,导致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大量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而某些地方政府往往选择站在投资方的立场成为打击农民工的辅助力量,导致农民工在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几乎无处申诉。今天,这种状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中国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措施仍未得到足够的落实,这也是对农业劳动者不能一视同仁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

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论述,参见张勇:《文化、制度与发展》,载《经济学家》,2008(5);以及张勇、古明明:《中国与拉美改革比较》,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5)。

有所转变的一个反映。

(二)合理地调整经济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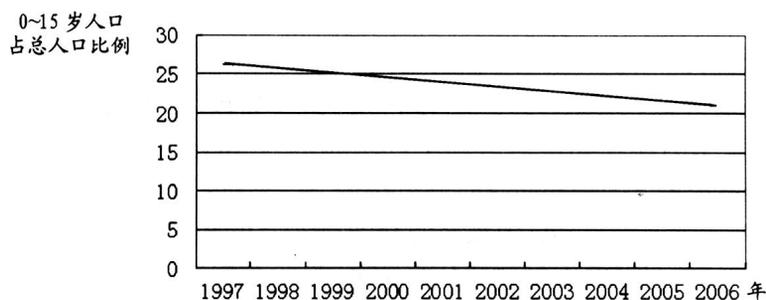
本文的模型假定信息是透明的,且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得到这些信息,同时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没有成本。但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巨大地理差异和处于特殊政治体制的国家,这两者都不现实。因此,增加对劳动力的就业指导,提供必备的信息非常关键。同时,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相关资源的地域分布极为不合理,东部地区,尤其是少数特大城市资源集中度非常高:北京、上海不仅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还拥有中国大量优质的教育和人力资源,行政性的政策保护更加重了这种状况,导致东部大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而西部的发展受到限制,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其GDP、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进出口额分别占到全国的35%、69%和77%。

对比美国的资源布局会发现,其首都只作为行政中心存在,而主要的经济中心城市相对较均匀地分布在东部、西部和北部,其教育资源的配置也相对均匀,而不是主要集中于纽约、旧金山或华盛顿这样的中心城市,同时每个经济中心和教育中心都辐射带动了一批卫星城市和产业群的发展。这样每个经济中心都可以辐射一部分周边区域的发展,劳动力可以就近流动和转移。相反,中国发达的城市大多距离十分靠近,这样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成本就相当高,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的发展。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分布格局,扭转经济和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局面。对于中国的西部而言,最迫切的不是平衡发展的问题,而是首先需要建立几个强大的中西部经济中心,采用政策引导和行政鼓励等手段引导教育和经济资源向西部中心城市转移,并通过该中心辐射到周边地区。另外,企业竞争力往往是地区竞争力的根本,因此除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倾斜外,还必须鼓励西部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现代化企业,以大企业为龙头加快产业资本向西部中心城市的转移。中国西部的重庆、成都、西安和兰州等城市拥有大型企业和名牌大学等各种经济和教育资源的数量还太少,政策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同时,中国还需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的就业水平,避免大城市病的重演。这对于减缓日益严重的交通压力,降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十分重要。

(三)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所提供的人口红利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动力的成本极其低廉,加上一系列保护政策导致的中国商品价值远低于其实际价值,增强了这些劳动力的竞争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在未来的6年左右时间内将趋于稳定,并在其后开始下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制造”当前遇到的问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以低成本的劳动力取得的竞争优势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由图1可以看出,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表现在0~1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劳动力不再像过去那样几乎完全是免费的,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说明了这个问题。



说明: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见 www.worldbank.org。

图1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转型的关键是提高知识和技术对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传统的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带来的挑战。但是制(下转第68页)

关于这点,见新华网财经频道:《我国东部成支撑国民经济重心 GDP比重超过60%》,见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23/content-3959103.htm>,2005-12-23。

关于劳动力转移和资本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见张勇:《龙与象:中印改革与发展比较》,载《统计研究》,2008(10)。

Spillovers for Fundi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 Iowa State University Staff Paper ,No. 305 July 26 ,pp. 1 - 23.

38. McMillan, John; Whalley, John and Zhu, Lijing, 1989. " The Impact of China '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4) ,pp. 781 - 807.

39. Mead, Robert W. ,2003. " A Revisionist View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 "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21 (1) , pp. 117 - 131.

40. Rosegrant, M. W. and Evenson, R. E. ,1992. "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Sources of Growth in South Asia.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56 ,pp. 757 - 761.

41. Schultz, Theodore W.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2. Tang, A. M. ,1982. " An Analy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ainland China, 1952 - 80. " Chung - 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Taipei, Taiwan.

43. Wen, G.J. ,1993. "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 's Farming Sector: 1952 - 89.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2 ,pp. 1 - 41.

44. Wu, Shunxiang; Walker, David; Devadoss, Stephen and Lu, Yao - chi, 2001. "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ts Components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fter Reforms. "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3) ,pp. 375 - 391.

45. Xu, Xiaosong and Jeffrey, Scott R. ,1998. "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griculture: Evidence from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18 ,pp. 157 - 165.

(责任编辑:孙永平)

(上接第 47 页)度背景决定了中国对某些产业部门的持续保护,会降低其整体的竞争力,而当前必须敢于牺牲某些部门的利益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制度的制约导致中国对教育的投入一直较低,其占 GDP 的比重只有印度等国的 1/3 左右;而且长期以来对于教育和学术自由的某些限制也使中国教育的竞争力较低,这些都是妨碍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于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把教育作为当前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改变对农业劳动力的态度、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无论是对我国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城市就业水平的提高还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均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仙娥、王春艳:《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载《中国农村经济》,2004(5)。
2. 林毅夫、蔡 昶:《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5)。
3. 普拉纳布·巴丹:《觉醒的“泥足巨人”:中印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2007(33)。
4. 姚程:《亚洲国家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比较与借鉴》,载《农业与技术》,2006(4)。
5. 赵树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就业》,载《当代亚太》,1998(7)。
6. 张勇:《文化、制度与发展》,载《经济学家》,2008(5)。
7. 张勇、古明明:《龙与象:中印改革与发展的比较分析》,载《统计研究》,2008(10)。
8. 张勇、古明明:《中国与拉美改革比较》,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5)。
9. 张勇:《“金砖四国”的改革比较》,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12)。
10. DeVoretz, D.J. ,1995. " Returns: The Economics of Canada 's Recent Immigration Policy. " The C. D. Howe Institute, Toronto and the Laurier Institution, Vancouver ,pp. 293 - 330.
11. Feridun, Mete, 2005. " Investig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Host Country: The Case of Norway. " Prague Economic Papers, Vol. 4 , pp. 350 - 362.
12. Lieberman, R. C. and Shaw, G. M. , 2000. " Looking Inward, Looking Outward: The Politics of State Welfare Innovation under Evolution. "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2) ,pp. 215 - 240.
13. Laryea, S. A. ,1998. " The Impact of Foreign - born Labor on Canadian Wages: A Panel Analysis. " Vancouver Centre of Excellence: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n the Metropolis (RIIM), February Working Paper, No. 98 - 06.
14. Marr, W.L. and Siklos, P.L. ,1994. " The Link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Canada. "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16 , pp. 1 - 26.
15. Morley, B. ,2006. " Causalit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mmigration: An ARDL Bounds Testing Approach. " Economics Letters, Vol. 90 , pp. 72 - 76.

(责任编辑:陈永清)

见张勇:《文化、制度与发展》,载《经济学家》,2008(5)。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关的比较分析,见张勇、古明明:《龙与象:中印改革与发展的比较分析》,载《统计研究》,2008(10)。